

第 11 卷第 1 期 2018 年 5 月

Vol. 11, No. 1, May, 2018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主题

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受到攻击吗?	1
校园内的“言论自由”与“攻击性”言论.....	4
高等教育体系、大众化和研究型大学.....	6

有关国际化的视角

亚美尼亚：跨国高等教育.....	8
毛里求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与前景.....	11
乌克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担忧与希望.....	14

免学费?

免费高等教育：误解了平等和公平.....	16
以收入为目标的免学费的出现（和危机）.....	19

经济困境

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及预算削减.....	21
又一个错失的良机？资助不足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23

聚焦非洲

排名中的风暴：非洲视角.....	25
科学研究：非洲大学“迷失的使命”.....	28

聚焦南亚

印度：世界一流大学	30
足够的数量：是时候关注巴基斯坦研究人员的素质了.....	33
学生多样性与印度高等教育包容性的挑战.....	36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扩张的矛盾.....	38

聚焦中国

东亚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40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缓慢路径.....	42
刚性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创业公司”：中国的年轻精英院校.....	44

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受到攻击吗？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荣誉教授、前主任，
英国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国际合作研究员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渐增的差距

高等教育常被视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特别是在由国家提供资助的情况下，因为其利益延伸到个人和社会。它是人力资本、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源泉，在巩固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推动和维持社会和公民所需的个人、社会和经济理想及发展。因此，有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通过税收和公共政策平衡公共支持，以取得院校自治。

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公立和赠地大学 (grant university) 就是这种平衡的一个良好例证。建立大学是为了实现“公开表达的目的”，而院校在确定和主张质量和价值方面保留了强有力的作用。一个潜在的假设是，通过教学、科研和服务/参与来代表和促进公共利益，(公立)大学的行动和成果本身符合公共利益。

如今，许多支持公共资助高等教育投资的假设并未被证实。在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落后于人——他们正努力符合社会和个人的期待。社会商品的不平等分配伴随着一种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好的看法。经济、科研、发展和创新的好处影响范围有限，仅限于大城市中。而且，我们正与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城市和国家竞争。

英国和美国的调查显示，大学和教师被

认为对学生的学习或成果漠不关心。虽然两国大学在全球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就读哈佛和耶鲁等精英大学的美国学生，占全部美国学生的比例不足 1%；同样，只有 9% 的英国学生就读于牛津大学或罗素集团的大学。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最近的选举结果中，以及其他地方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局势中，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观就是明证。对比位于/生活在着眼全球的城镇和仅聚焦当地的大学/民众，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紧张关系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高等教育面临压力。

- 在美国，认证历来是由联邦政府、地区认证机构和州政府组成的“三合会”的共同责任，院校提供主要支持。联邦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小。然而，多年来，人们越来越担心学生的毕业和就业能力，特别是在大学费用和学生债务上涨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大学计分卡”(College Scorecard)，“使大学对成本、价值和质量负责”，并向公众监督公开高等教育绩效。此外，国会还有一些旨在加强认证实践和认证机构实践的举动。

- 在英国，“教学卓越框架”(the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的第一版已经发布。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位课

程质量信息,提高教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教学卓越框架”取代了以前的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实践,后者为院校提供了冗长的报告,因此不适合衡量和比较学生的表现和结果。质量保证常因过多的官僚主义和繁杂的逐项核查操作而饱受诟病。这些发展导致了信任的崩溃和排名已经填补的差距。“教学卓越框架”涉及一系列需求和利益,包括更令人怀疑的政治制度和公众,以及多元化的教育市场。

- 在爱尔兰,2010年,政府在《2030年国家高等教育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的愿景。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专家组形成了一个“整体系统”的概念,与大学排名频繁发布的观点相反,这一概念提高了个别院校的表现。该战略也承认了国家规模和预算的限制。政府试图通过一个名为“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的协商过程使院校担起责任,以确保院校使命和绩效与国家总体政策目标更好地协调一致。科研优先战略也被采用,将资金与主要工业部门联系起来。

- 在荷兰,近几十年来,一系列事件导致政府更多的参与,意图使大学更具生产力和效率,并引入长期科学规划的原则。这之后,人们开始关注院校差异和学生表现,尤其是学生保留率低,系统无法满足学生和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需求。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都通过协会与相关政府部门签署了联合战略协议,协会为这些协议提供了框架。个别高等教育机构制定的协议包括关于系统结构、院校概况和项目的声明和目标,并与资金挂钩。

是时候有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了?

这些例子说明了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日

益紧张的一些情况变得更加明显,有时甚至是有争议的,这些情况经常用(社会)问责制与(院校)自治方式来描述。匈牙利、印度和土耳其最近的事件和决定也揭露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都集中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问题,以及大学、政府和公众在实践中如何确定“公益产品”。

政府“侵入”传统上与学术自治相关的领域,如关注绩效和成果,往往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的证据。最近,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思想 and 政策抬头,限制外国人,阻止多元文化主义,质疑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这使得高等教育与政府相持。这些“意识形态”的发展使学术界撇开真正的批评,从而引起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傲慢和孤立主义的担忧。

爱尔兰又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所大学未能回应举报人对财务违规的合法指控,导致整个部门受到公众监督。反之,大学也认为公共资金的减少已将公立院校转化为私立院校,从而改变了治理模式。然而,这样做的时候,大学已经有效地将其“公益”角色重塑为一种交易关系——带来了一堆麻烦。

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大学治理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严格的监管到远程操控,到新的社会契约。后一种模式是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聚在一起,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爱尔兰、荷兰、新西兰、挪威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正在采取这种做法。这一过程显示了不同目标不必相互排斥的潜力,对社会的回应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赋予院校其目标合法性。

鉴于国家在历史上为大学的需求提供了条件,而今天,在全球化时代和接近普及的高等教育时代,高等教育机构满足了社会的

需求。在这种新环境下，高等教育可以选择有意义地帮助构建新的社会契约，或者国家将对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注：本文基于《公益产品和公共政策：什么是公共利益，谁（什么）来决定？》（E. Hazelkorn and A. Gibson, 2017,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policy: What is public good, and who and what decides?. CGHE Working Paper 18. London: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 详 见 : <http://www.researchcghe.org/perch/resources/publications/wp18.pdf>。

校园内的“言论自由”与“攻击性”言论

Peter Scott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高等教育教授、
苏格兰公平入学专员 (the Commissioner for Fair Access for Scotland)

电子邮箱: p.scott@ioe.ac.uk.

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威胁来自以下群体: 从匈牙利、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威权政权和被宗教原教旨主义所困扰的中东国家, 到认为自己的文化和社区受到攻击的右翼民粹主义者 (通常将大学视为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堡垒)。

但是自由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和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学生们已经开始改造校园建筑, 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十四点和平原则》的作者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总统的作品, 这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可挑剔的自由原则。继开普敦学生的成功之后, 牛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的学生试图复制“罗德斯必须倒下” (Rhodes must fall) 运动, 尽管引发问题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 在奥里尔学院 (Oriental College) 的牛津雕像是一项较温和的事件。

令人困惑的政治回应

即使在民主国家, 政治反应也是混乱的。例如, 在英国, 政府立法要求大学领导人保证为不受欢迎的 (右翼?) 演讲者发表自由言论, 并抵制旨在排除他们的“无平台”运动。但与此同时, 政府坚持认为, 同样的大学领导人应禁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试图激化学生的行为, 甚至新建了民主思想中以前不为人知的新类别, 如“非暴力极端主义”。

事实上, “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性”

最好不要被看作是对立的原则, 而将其看作某一范围的一部分。明智的人不会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 首先, 因为任何人无权在拥挤的电影院里请求火力支援 (或者在多文化的校园里使用种族主义语言)。其次, 因为自由言论一直在法律体系内行使。事实上, 一些最热心的倡导者认为, 保证言论自由的正是法治。

正在变化的环境

与其试图建立一些绝对的原则, 还不如找出影响这个观点辩论的一些趋势, 这可能会更有帮助。首先, 一直存在着关于科学 (绝对) 有益的正当辩论。过去, 人们反对的不是科学本身, 而是它的用途。现在, 这些辩论更进一步了。无疑, 干细胞研究和人类基因组学以及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 (的某些方面) 被视为对人类生存的自主性甚至神圣性提出了问题。

第二个转变针对的是一个更混乱、破碎、动荡以及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全球环境。当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宣布“历史的终结”时, 1989年后凯旋主义的令人振奋的日子是遥远的记忆。随着所谓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意识形态的斗争又复活了——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英国决定离开欧盟, 普京、埃尔多安等人政治统治地位的崛起。不可避免的是, 这些新的不安反映在校园里, 激起了“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的激烈争论。

这些都与第三轮变化浪潮有关，即所谓的“身份认同（identity）”政治的兴起。传统的社会认同标志，如国籍、宗教、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已经有新的标识加入进来，其中一些已经（相当）固定，如性取向，而另外一些更具流动性，与生活方式偏好和文化习惯相关。校园往往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这些更具流动性，甚至是实验性的社交标记最为明显。那些有着非标准社会、文化甚至性别偏好的人不再满足于抵制歧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中的学生群体比他们所取代的精英大学系统下的学生更具多样性。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已成为反映所处社会多样性的“彩虹”系统。

这种多样性对于“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性”的辩论具有重要意义。首次，弱势群体，从这些辩论中的语言调整获益最多，现在在校园中占据一席之地，且通常具备一定力量。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度被认为是普遍且绝对的，更可能被前者视为带有偏见的和具有党派特征的。行使自由言论很可能被解释为无法容忍，这似乎威胁到他们的身份或文化，甚至威胁到他们在高等教育

中岌岌可危的地位。

大学的责任

从这些变化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性”辩论的基调带来的影响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没有绝对的事物。没有任何社会给予公民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尽管大学应该提供一个这样的自由空间，行使这些自由，它们符合（甚至稍微超出）这些法律规定的和社会授权的限制，但是没有任何校园会认同“什么都可以”。另一方面，尽管敏感性和脆弱性应该受到尊重，但如果自由且活跃的知识探索处于严重受阻的危险中，那么予以尊重的程度是有限的。我们要做到务实，力求在不同的地方、时间做出不同的平衡。

其次，大学正处于或应该处于寻求这种不断变化的平衡之中。以批判性探究形式表达的自由，是学术界的核心价值。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培养简单的技术专家，而是基于大学教育的重要公民。进步的科学和开明的学问也是如此。但是，语言的节制和学术界的相互尊重，也是大学和大学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不应太频繁地激起言论，以保护那些弱势群体或者无意地煽动那些一心想要审查的人。

高等教育体系、大众化和研究型大学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过去七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学生人数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功能日益多样化,其扩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是高等教育真正的革命。就在过去十年左右,全球招生人数翻了一番。然而,也有极少数国家至今还未做出全面努力,以此建立界定和差异化明确的学术体系、为新的学术功能服务、确保质量得以维持,或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的广泛需求。

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和全球化,需要越来越高的技能水平来维持,高等教育被要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高等教育的文凭资格已成为社会流动和进入技能型就业市场的先决条件。高等教育机构的日益多样化已回应了大众的入学需求;然而应注意的是,虽然格局多样化,但并没有连贯一致的区分。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传统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培育学术人员,开展研究,参与全球知识网络,同时还要使专业人士做好准备以担任社会领导职务等。在大众化之前,这些传统大学主导了高等教育。现在,在大多数国家,它们通常是少数派。然而,作为领先的学术机构,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但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预算压力,越来越高的责任要求,以及争做“世界一流”的全球竞争。其他高等教育部门则将这些著名大学视为领导者,但研究型大学大都保留了其传统的角

色。它们大都还未意识到自己是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未意识到有责任为更广泛的学术界提供一些领导。

显然,需要协调各地出现的、令人困惑的高等教育机构群列。在许多国家,私营部门有相当数量的新机构,其中越来越多的机构是营利性的。确保私立高等院校在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和可接受的质量水平下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适应市场需求,出现了普遍不受阻碍的多样化发展,这需要由有意识的努力来取代,以发展差异化的学术体系来服务过去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目标。这样的制度应该认识到不同类型院校的具体作用和责任,并确保有效协调和承认每一类学校的重要性。

虽然研究型大学处于学术体系的顶端,但它们必须认识到,它们是多层体系的组成部分。研究型大学只是庞大而复杂系统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这些单一的院校不会过度扩张,而系统的其他部分不会效仿研究型大学。

在德国汉堡,柯尔柏基金会 (the Körber Foundation)、汉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和德国校长会议 (the 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 HRK) 在一年两次的“汉堡跨国大学领导人会议” (Hamburg Transnational University Leaders Conference)

期间讨论了这些挑战，主题是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学术体系。来自世界各地的 50 位大学领导人讨论了这一主题，并发表了以下反映他们观点的言论。

《汉堡宣言》：组织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

研究型大学的角色

- 研究型大学作为顶尖的学术机构，是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它培育的是为社会、学术界、工业界和广泛经济服务的领导者、科学家和学者。它开展研究，是国际科学的窗口。
- 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成功的核心，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 研究型大学在日益复杂多样的学术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由大量服务于不同群体和需求的院校组成。研究型大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必须保持其在教学、科研、人格发展、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建设性地参与和引导其他高等院校。

有效差异化的要求

要使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差异化过程以科学设计和价值导向的方式进行，需要以下步骤：

- 明确区分：应明确界定和保护各类高校的使命。控制措施应力求保持适当的学术区分。我们注意到，全球学术排名常常通过促进同质性来阻碍分化。
- 自主性：高等教育机构应被赋予管理其使命所需资源的权力。

- 资金：必须建立可预测的资金来源，足以实现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
- 质量：由学术专业人员设计和执行的质量保证体系必须是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特征。
- 渗透性：应该有衔接机制，允许学生公平地接受高等教育，使他们能够轻松地在不同类型的院校间移动，而不会失去其学术地位。
- 一致性：私立高等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部分，需要认真整合到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

《汉堡宣言》反映了五十名参会校长和赞助组织的关切。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学生和学术机构的数量大幅增加，也意味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幅增加。核心挑战是确保高等教育的合理性，目前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尚未得以解决。此外，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和复杂的全球化经济也需要得到充分的关注。

注：有关在汉堡的审议意见报告可以从柯尔柏基金会免费下载：
http://www.bc.edu/content/dam/files/research_sites/cihe/pdf/Korber%20bk%20PDF.pdf。该报告已成书发表：《应对大众化：全球高等教育的分化》(Philip G. Altbach, Liz Reisberg, and Hans deWit, eds., *Responding to Mass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Worldwide*, Rotterdam, Netherland: Sense Publishers, 2017)。

亚美尼亚：跨国高等教育

Tatevik Gharibyan

亚美尼亚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高级教育政策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休伯特·H·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研究员（2016~2017 年）、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tatevikgharibyan@gmail.com

随着苏联解体，亚美尼亚于 1991 年独立后，高等教育部门开始自主重塑。大量的私立和跨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起来，自称为大学，因为在当时还没有相关规定来决定是否有权使用“大学”一词。政府通过申请许可和认证机制来减少它们的数量，并且正在实施一项持续的合并政策，但亚美尼亚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仍相对较多。

亚美尼亚大约有 300 万居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4.31%。亚美尼亚有 65 所公立和私立院校：其中，23 所公立非营利院校，31 所私立营利性院校，4 所“跨国”院校和 7 所外国高校分校。跨国高等教育机构是根据亚美尼亚共和国（或国家参与）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国家间协议建立的院校。它们的活动受到两国法律的规范，并得到两国的许可和认证。

作为国际化动力的跨国教育

一方面，由于国家监管框架薄弱，缺乏监督合作伙伴关系的质量保证标准，跨境高等教育给亚美尼亚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此同时，跨国院校的建立也加强了亚美尼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加剧了高校之间的竞争。通过免除一些具有约束力的监管法规，亚美尼亚政府为跨国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持，其目标是至少吸引相当数量的（全球约

800 万）亚美尼亚侨民。

凭借 2005 年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区域”（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亚美尼亚有机会参加“TEMPUS 计划”（Trans-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和“伊拉斯谟+”（Erasmus+）能力建设项目，为亚美尼亚高校与欧洲院校建立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亚美尼亚的院校正利用这些机会与欧洲伙伴建立联合/双学位项目，并使其项目国际化。

亚美尼亚的跨国高等教育

亚美尼亚有几种跨国教育机构：跨国院校、特许经营机构、联合/双学位提供机构、国际分校、独立机构和网络教育项目。

根据亚美尼亚的立法，所有教育机构和计划都必须得到教育和科学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的许可。虽然提供联合项目和双学位的大学都需要获得许可的，但制定和实施联合项目以及监督院校之间关系的程序和标准并不受亚美尼亚立法的管制。最近，新高等教育法草案已经有所变化，还增加了对双学位课程的适当规定，但这些变化还没有实施。

对于机构或项目认证，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在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保证基金会（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undation)、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注册局 (the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注册的任何质量保证机构, 或者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中进行选择。与欧洲高等教育区以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 (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分支机构) 共同实施教育计划的机构可以选择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保证基金会或从教育和科学部批准的机构名单中选择任何其他公认的质量保证机构。值得注意的是, 联合项目的质量保证没有标准和指导原则, 这几乎对所有的博洛尼亚成员国都是一个问题。

亚美尼亚的跨国教育机构有哪些?

亚美尼亚的跨国教育机构主要包括:

- 亚美尼亚美国大学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Armenia), 在亚美尼亚和美国政府 (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拨款)、亚美尼亚通用慈善联盟 (the Armenian General Benevolent Union) 和加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支持下建立。亚美尼亚美国大学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私立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运作, 授予美国资格证书, 并获得美国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 (the WASC Seni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mmission) 的认证。亚美尼亚美国大学提供研究生和本科科学学位课程以及预备和继续教育课程。它设有研究中心, 解决关键的国家 and 国际问题。亚美尼亚美国大学对亚美尼亚学习者极具吸引力, 吸引了最好的学生。

- 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 (The Russian - Armenian University) 是一个公立营利性大学, 是根据两国政府之间的国家间协议建立的。因此, 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授

予双重资格证书, 在五所学校内有 31 个部门。该大学与俄罗斯和欧洲的合作大学提供数个联合研究生课程。它也有几个科研集群。

- 亚美尼亚法国大学 (The French University in Armenia) 是根据两国政府之间的国家间协议建立起来的, 并通过特许经营协议与里昂第三大学 (Jean Moulin Lyon) 合作。亚美尼亚法国大学是授予双重资格证书的私立非营利院校。

- 亚美尼亚欧洲地区教育学院 (The European Regional Educational Academy of Armenia) 是另一个国家间的非营利公立院校。该学校由亚美尼亚政府建立, 并根据与多个欧洲国家的教育机构签署的特许协议而成立。该机构颁发亚美尼亚资格证书。

根据国家排名制度, 其中两所大学, 即美国亚美尼亚大学和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 在亚美尼亚教育体系中具有竞争力, 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同时,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有 7 所分校活跃在亚美尼亚。这些分校授予其母校的资格证书。考虑到这些院校没有公开的信息, 这些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尚不明确, 它们所提供教育的质量也不可能有太多信息。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埃里温分校 (The Yerevan Branch of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在亚美尼亚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刚刚起步。它成立于 2015 年, 至今尚未有毕业生。埃里温分校提供七个学科领域的本科课程; 大部分与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重叠, 这引起了如下疑问, 两所大学是否会争夺同一学生群体。另一方面, 通过吸引更多的独联体国家的学生, 埃里温分校在市场上的出现可能会增加该部门日益国际化的价值。

未来会怎样？

尽管亚美尼亚私立大学的数量很多，但大部分学生（约 87%）仍然选择就读于公立和跨国院校，这些院校的费用非常昂贵。大约 15% 的学习者选择跨国院校，这一比例正在稳步增长。这些数字和国家排名的评估结果（私立大学位次较低）告诉我们，亚美尼亚私立院校质量低下，且它们还不是很强的竞争者。

相比之下，跨国教育机构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为学生提供了用亚美尼亚语以外的语言学习的机会。鉴于立法阻碍了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以外语开展项目，这导致跨国和国立院校的条件不平等，国内大学的投诉也越来越多。

鉴于上述种种因素，亚美尼亚跨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可能会增加，迫使国立院校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化政策以开展竞争。

毛里求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与前景

Shaheen Motala Timol、Kevin Kinser

Shaheen Motala Timol: 高等教育委员会 (the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质量保证和认证官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休伯特·H·汉弗莱研究员 (2016~2017 年)、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sam776@psu.edu

Kevin Kins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主任、教授, 跨境高等教育研究团队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C-BERT) 联合主任

电子邮箱: kpk9@psu.edu

为了与全球高等教育趋势保持一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毛里求斯将国际化视为实现知识中心地位并成为区域卓越中心的关键战略。2000 年, 政府在新经济议程 (New Economic Agenda) 中提出了这一愿景。从印度洋的战略位置到与欧洲的历史关系及其双语教育体系, 这个岛屿都有其特定的优势来支持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景。自 1968 年独立以来, 通过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以及从传统部门向服务部门的多样化发展, 毛里求斯已经证明, 它是多个领域的全球参与者。本文讨论了毛里求斯通过国际化将高等教育作为其经济主要支柱的途径及其面临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发展

将毛里求斯发展成知识中心的《2000 议程》(the 2000 Agenda) 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部门现有的国际化活动。实际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毛里求斯的公立和私立院校已通过跨国教育参与了国际化, 主要是与发达国家的大学合作。私立院校通过特许合作伙伴关系提供项目, 有些还招收参与海外远

程教育项目的学生。公立大学正在与外国大学合作, 在当地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提供联合学位。公立院校任命海外的外部审查员也为国际项目和课程带来了一个国际维度, 确保它们符合国际标准。

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 (The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于 1988 年成立, 负责监管该部门。2007 年, 当现有的监管框架得到巩固时, 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2010 年, 当毛里求斯转变为知识经济的愿景有了新的发展, 毛里求斯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了达到政府目标的措施。与之前采取的逐步渐进的方法相反, 毛里求斯选择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战略。就本土而言, 目标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 以便每个家庭都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国际化目标是到 2020 年吸引 10 万名国际学生和至少一所世界一流的院校。为迎合外国学生的需求, 教育部设立了“一站式”办事处——“学在毛里求斯”。鼓励已在跨境教育方面有经验的私立院校扩展项目, 与知名大学合作。国际学生签证的行政程序速度加快。投资委员会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与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 在该地区组织学生教育展和投资促进战略。

国际化的障碍

实施和试行这些新措施并非没有风险或是意想不到的后果。通过降低入学门槛或提供替代路线来开放高等教育机会, 无疑会影响招生质量, 从而影响教育质量和就业能力。政府为未就业青年和毕业生推出了不同的培训计划, 最新的是 2015 年毕业生就业培训计划 (the Graduate Training for Employment scheme), 旨在为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相关技能以提高其就业能力。

公立大学入学人数在 2000 年约为 9 000 人, 2014 年增加到 22 800 人。公立大学毫无准备, 并没有增加额外资源为更多学生提供服务。虽然它们从事国际化活动, 但却没有正式的国际化政策。除了附属于私立医学院的情况外, 它们的市场仍局限于本地学生。毛里求斯大学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是这个国家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 发展这所大学是毛里求斯成为知识中心最为明智的决定。2010 年, 该校任命了来自海外的副校长, 将国际视野带到了大学领导层, 但他于 2012 年辞职。同时, 在 2012 年, 毛里求斯又创办了两所新大学, 一所致力于远程教育, 另一所则是两所理工学院合并的结果。

在 2000~2014 年间, 私立院校的入学人数从 5 250 人增加到 18 000 人, 但这对国际学生来说还不具吸引力。在 50 所私立院校中, 只有少数学校拥有校园设施, 这是国际学生在选择院校时考虑的一个因素。私立院校提供的课程也很昂贵, 这对全日制学生来说是一个财务障碍。一些私立院校利用新的政府政策吸引国际学生, 并在孟加拉国等国

大量招收学生, 重点突出那些没有正式入学要求的项目。有些国际学生来毛里求斯工作而不是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向海外招聘机构支付了大笔费用。管理这些特别的问题, 并确保私立院校对其国际营销战略更负责任, 这超出了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的权限范围。

分校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 (Middlesex University) 和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Wolverhampton University) 以及印度的 EIILM 大学 (EIILM University) 在 2014 年之前在毛里求斯设立了分校。继 2013 年印度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发布的公报——它未授权印度大学在海外设立分校, EIILM 大学 (毛里求斯分校) 宣告关闭。伍尔弗汉普顿大学分校在 2015 年关闭, 可能是因为学生人数偏少。另一家英国院校——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在毛里求斯的合作项目未能成功。

尽管在 2010~2015 年, 国际学生人数从约 500 人增加到 1 500 人 (非洲的入学人数稳步增长), 但毛里求斯想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中心所需的国际学生人数还远未达到。此外, 自 2007 年以来, 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一成不变, 也没有得到修改, 以便为世界一流大学在毛里求斯设立分校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

到 2014 年底, 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迎来许多新的挑战。国际学生人数的增加创造了超越教育的额外服务需求。为了支持国际化, 几个部门不得不修改健康、劳工、住房、移民等方面的政策, 并共同努力解决与留学新生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在情况如何?

随着 2014 年 12 月新政府的选举, 高等

教育部被关闭，高等教育再次被整合到教育部的框架之下。此后，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在质量保证活动中采取了谨慎态度。毛里求斯政府目前正在对影响高等教育部门的立法进行整合。

从毛里求斯的情况来看，实施国际化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国际化必须可持续地进行规划，并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其次，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来实现目标，鼓励创新型企业并防止滥用。第三，公立大学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来推动国

际化。第四，必须为拥有不同议程的私立院校量身定制战略。第五，高质量的外国大学既需要一个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又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来吸引它们进入新的国家。第六，跨国高等教育需要互惠互利的协议来支撑。

过去的这些年一直动荡不安，但这为毛里求斯更好地规划和推进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国际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经验。毛里求斯需要利用其独特的背景优势，设计一个有具备文化内涵的监管框架，以配合其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部门。

乌克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担忧与希望

Irina Sikorskaya

乌克兰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高等教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irinasikorskaya0207@gmail.com

作为将教育服务提升到国际卓越水平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最近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活动。经过几十年的隔绝孤立之后,乌克兰的高等教育机构逐渐接受了国际化,特别是学术流动举措和双学位课程,并鼓励更多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教师和学生与乌克兰的高等教育院校建立联系。从 2005 年起,“博洛尼亚宣言”的指导方针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乌克兰的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国家政治动机是院校层面推行改革的关键动力,但现在,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发布教育指导方针,并监督其贯彻执行。

院校视角的国际化

鉴于共同的社会、学术和历史背景,乌克兰高校的国际活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目前,它们主要依靠三大支柱:招聘外国学生;组织学生和工作人员流动;参与国际项目。

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散的而不是系统化的方式发生的,并不是由特定机构的使命、传统或当前环境塑造的。这可能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缺乏领导层的管理技能。然而,高层领导层承认国际化的重要性,至少是口头承认,都表明该体系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主要重点是招收

国际学生。乌克兰高校试图以吸引国际学生来赚取收入并获得认可。外国学生入学的主要障碍仍是语言能力、签证要求、官僚主义、找到合适的住宿、学分认可以及文凭认证问题。国际学生融入所读校园仍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领域。为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游说。

学术界对国际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参与程度最多也就是平均水平,非常有限。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惰性以及积极性的缺乏阻碍了进步。年轻教师可能会比许多资深教师更支持国际化,因为资深教授们对国际化带来的变化感到不适。反对国际化的学者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文化和安全的威胁。显然,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问题包括优秀师生的人才流失,特别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因为他们选择在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学习和开展学术工作。

尽管在国际学生招生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大部分乌克兰学生仍然无法获得流动机会。大多数非流动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与校园里的国际学生和学者交流来了解文化多样性。在这里,有国外教学与科研经历的教育者可以帮助缓解学生缺乏国际经验的问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乌克兰学者与国际合作伙伴的科研合作数量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包括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设施不足,缺乏能够执行国际科研任务的工作人员,缺乏对国际学术和科研传

统的了解以及缺乏熟练的外语能力，这些导致了在国际期刊上的低发文量。现有科研合作的少数例外情况通常由个别教员发起。只有少数大学，大都是技术大学，设法克服这些障碍。乌克兰大学需要做出转变，重视国际科研合作，并在国家层面战略性地协调所有努力。

国际双学位课程并不常见。不明确的国家立法是此种举措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为数不多的双学位项目是由“Tempus 项目”（“伊拉斯谟+”是自 2014 年开始的）推出和资助的。为联合项目提供额外资金的机制必须更为详尽阐释。

另一个财政问题可以在院校层面上确定：公立院校目前是在减少的国家资金和不断增加的运营成本下得以运行。国家没有提出或拨出大量资金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乌克兰许多大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各种腐败：偏袒、剽窃、裙带关系和其他非生产性行为，包括贿赂获得入学名额、考试分数和论文评分。国际活动也不例外，因为腐败空间依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和学术人员参与国际项目或交流项目已变成了僵化的激励机制，“徇私”可能会填补学者的低薪问题，然而大大损害国际活动的准入、质量和公平。

最近，乌克兰的大学在几个阿拉伯国家

的声誉下降，政府拒绝承认乌克兰毕业生的毕业证书。许多国际学生行贿获得文凭已受到乌克兰教育和科学部的极大关注。然而，媒体确实让公众公开了解高等教育近期的发展情况，包括教育项目质量和腐败问题。

尽管如此，乌克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有积极发展的迹象。现在，大多数乌克兰高校显示出增加学生海外流动的积极转变，教师们愈发愿意参与促进国际化的活动。通过吸引外国学生和讲师，加大校园国际文化建设力度。乌克兰学者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人数大幅增加。因此，尽管许多障碍和社会经济现实依然存在，但乌克兰的大学期望自己的国际化努力很快得到回报。

结语

乌克兰高校在尝试国际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它们的努力受到缺乏资金和政府缺乏战略眼光的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是由参与国际活动的个人推动的。展望未来，由于国际伙伴关系而建立的教育项目需要整合和创新。

乌克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由一些国家的改革引发的，但实施和质量保证的责任存在于院校之中。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和全球需求，加强科研和教学质量，乌克兰大学必须大力推进国际化。

免费高等教育：误解了平等和公平

Ariane de Gayardon

英国伦敦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员

免学费运动遍布全球：从 2013 年的智利学生运动到 2016 年的南非“费用必须取消” (#FeesMustFall) 运动，以及 2017 年菲律宾取消学费的决定。普通民众，特别是学生及其家庭似乎认为，取消学费将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包括（更具体而言）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然而，未有证据表明免费高等教育可以增加学生的入学机会和成功，或是提高公平性。

不平等的学费系统

当今世界近 40% 的高等教育系统认为自己是“免费”的。然而，“免费高等教育”这个标签背后所隐藏的现实多种多样，很少有国家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免费学位。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完全“免费”的国家，也将补贴性教育限制在公共部门内。在这些国家，任何从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在自由公立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古巴、芬兰和挪威。其他国家，即丹麦和瑞典，最近又对国际学生引入了学费。

其他国家增加了名义上的费用 (nominal fees)，这些费用应该包括管理成本，同时保持学费为零。爱尔兰就是这种情况，目前的名义费用高于十年前取消的学费。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公共经济负担同时保持高等教育免费的最普遍的方式是限制政府补贴的名额数量。这些措施特别重

要，因为它们违背了呼吁免费高等教育背后的原因：它们限制了入学机会，往往是对最弱势群体进行惩罚。一些国家，如巴西和厄瓜多尔，已经为进入公立院校设置了标准化入学考试。其他国家，大多是前苏联国家和东非国家，实行双轨制，政府只在公共部门为一定数量的入学名额提供经费，而其他名额可以通过缴付学费获得。实际上，这两个系统，即个人获得免费入学名额是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偏向于家庭富裕的学生，这造成了同样的不公平现象。

总体而言，免费高等教育的确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许多现实因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免费程度如何，取决于许多因素，但很少保证普遍的入学机会。

入学机会与成功：拉丁美洲案例研究

为了说明入学机会和学费政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免学费政策，本文将着眼于拉丁美洲特定的一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都有免费公立高等教育，尽管阿根廷的公共体系是对公众开放的，而巴西的公立体系是通过标准入学考试来限制的。2016 年之前，智利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学费都很高昂，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系统之一（在调整为人均 GDP 进行对比后）。对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是一项启发性工作，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但它们资助高等教育的方式截然不同。

2013 年, 在这些国家中, 智利的毛入学率 (GER) 为 84%, 阿根廷为 80%, 巴西为 46%。智利的比例最高, 比巴西高出近 40 个百分点。因此, 学费政策本身并不一定限制入学机会, 在有学费的教育系统下同样也可以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

但是, 招生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言并非一个好的衡量标准。学业成功近来已成为高等教育入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系统的入学绩效必须包括毕业率。2015 年, 智利的毕业率估计为 60%, 阿根廷为 31%, 巴西为 51%。在这一方面, 智利在三国中排名第一, 毕业率是阿根廷的两倍。正如入学机会一样, 高等教育的成功似乎不是由学费政策来决定的, 免学费国家的表现可能不尽人意。

这些例子表明,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成功并非由学费政策决定, 实行免学费系统的国家可能会在这些领域不断努力, 而收费高的国家则会大放异彩。此外, 对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调查进行的分析表明, 在智利和阿根廷,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成功与个人经济背景无关, 而在巴西, 入学机会则高度依赖于个人经济背景这一变量。但是, 基于个人的文化资本情况, 所有国家都存在显著的不平等。这表明, 学费成本不是入学机会唯一的, 甚至不是主要的障碍, 并且, 实施免费高等教育不一定会导致入学机会的增加。因此, 这一事实打击了其倡导者的主要论点。

实行免学费政策

除了影响之外, 在考虑这样一个政策举措时, 审视实施免学费政策背后的现实情况至关重要。最近决定实行免学费的国家面临严峻问题。在智利, 政府正努力寻求资金以实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全民免费高等教育政

策。因此, 限制可以获得免费名额的人数, 导致了 2016 年仅有不到 18% 的学生获得免费高等教育教育。与此同时, 最近在菲律宾通过的免学费法已受到了免学费支持者的批评,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一举措目前的形式将加大不平等。同样, 厄瓜多尔政府在取消学费的时候出台了入学考试, 现在被指责为阻止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但是, 取消入学考试可能会对这样一个还无法满足额外入学需求的教育系统引起教育质量问题的。

实施免费政策并非易事, 最近的这些例子表明, 在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免费公立高等教育的国家出现的限制性因素, 在实施改革后不久就可能变成现实。除单纯的实施之外, 这些政策还需要长期考虑, 因为这些政策很难扭转, 例如, 因为大众的压力, 德国在 2014 年全面取消了学费, 这距其引入学费政策不到十年的时间。

因此, 最近推行免费政策的国家应该加以监测, 看看它是如何发展的, 以及免学费举措是否成功。截至目前,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结语

免费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对政策制定者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容易的举措, 因为毕竟, 这只是一个预算决定, 且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为。但实行免费高等教育昂贵而且复杂, 而且也不能提升增加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功。这主要是因为, 免费高等教育不是一项有针对性的政策; 它会影响所有人, 无论他们是否需要免费高等教育。虽然这一政策是平等主义的, 但它可以而且往往会造成不公平。

全球范围内, 免费系统存在公平问题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政治家们继续将免学费作

为一项奇迹般的社会政策来推行。但是，一项政策在一个系统起作用而在其他系统中无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是否应该花费更多

精力来制定公平的方式帮助学生支付高等教育费用，而非取消其成本呢？

以收入为目标的免学费的出现（和危机）

Alex Usher

加拿大高等教育策略协会（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主席

电子邮箱：ausher@higheredstrategy.com

公立高等教育曾经有两种广泛的学费争论。第一个很简单：免费。在服务时免费，没有任何费用，就是一个普遍的利益……对于那些有幸获此机会人来说（总体而言，免学费的国家学生数量更少，只需相对较少的资金来容纳学生）。第二个思路是收取费用，但为那些需要在支付学费上获得帮助的人提供各式贷款和赠款，从而创造有利的差别定价：富裕家庭比贫困家庭支付更多的费用。

后一种缴纳学费的观点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学生和家庭看到价格标签，但并不总是知道或理解那些抵消学费的补贴。有时这些补贴数额很大。例如在加拿大，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总额约等于国内学生学费的数额，但许多人还是觉得学费是一个重大的财务障碍。免学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一种浪费，它为那些无论是否缴纳学费均要上学的人提供补贴，不过，这更能被人们所理解。

新途径

但现在，西方正出现一种“第三类”收费方式：人们将其称为“以收入为目标的免学费”。此方式阐明了免学费问题，但需要将家庭收入列入审查。这一方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首次出现在英国，当时，收取学费需要进行简单的收入审查（从 1998~2005 年，来自收入少于 2 万英镑家庭的学生不用缴费，而家庭收入介于 2 万英镑到 3 万英镑的学生缴纳一半的学费费用）。现在，这种方

式出现在加拿大弗雷德里顿和新布伦瑞克，以及智利圣地亚哥。

在智利，这种做法源于偶然。巴切莱特总统在 2012 年上任，承诺为所有智利大学生免除学费，但本应为此买单的税收改革最终所带来的资金收入远低于预期的估算铜价下跌是部分原因。最后，这些钱只能为 60% 的最低收入家庭学生支付学费，约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

在加拿大，这一做法则是有意而为的。在 2016 年年初，安大略省政府在联邦政府拨款制度（在加拿大，援助由两级政府主要协力提供）改善的基础上决定“调整”自己稍显复杂的贷款免除和税收抵免系统成为中低收入大学生的“免学费”担保。实际上，院校并未被禁止收取学费，大多数课程项目的费用约为 6 500 加元。相反，政府承诺向家庭收入低于（大约）5 万加元的人提供相当于全省平均学费的补助。在这条补助线以上，学生仍然获得补助，但在一个依据规定而变化的范围内，家庭收入为 10 万加元的学生可以得到大约 1800 加元补助，而家庭收入为 16 万加元的学生则没有补助。新布伦瑞克政府从此也开始效仿类似的方案。在今年的省级预算中看到其他省实施相同的方案也不足为奇。

美国举措

在美国，这个想法也正迎头而上。在 2016

年竞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提出了一个类似智利的制度,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用于州立高等教育体系,如果他们同意停止向收入低于 12.5 万美元家庭的学生收取学费(或者大约 80% 的学生群体)。从联邦制的角度来看,这个想法总是有点“不切实际”: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如果收取学费等决定是由州政府控制,那么联邦政府的一些补贴如何能够保证一定的学费水平,这些问题就变的非常模糊。尽管克林顿的提议在 11 月 8 日宾夕法尼亚州表明赞成特朗普的那一刻终止了,但这一想法仍然在州的层面产生一定的共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纽约,科莫州长为那些家庭收入不到 125 000 美元、就读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或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学生提出了一种“免学费”形式。

科莫州长的提议与克林顿国务卿的不太一样,它更像安大略省而不是圣地亚哥的计划。基本而言,他为家庭收入低于 125 000 美元的学生提供与学费金额相当的补助。这一款项被称为“精益求精奖学金”(Excelsior Scholarship),将相当于学费减去学生已经通过佩尔助学金系统(Pell grant system)从联邦或州政府获得的任何补助金。

虽然所有这些举措都有一个共同点,但它们的分配后果却不尽相同。就加拿大的情况而言,收入低于 6 万美元家庭的学生获得补助;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家庭的情况更糟糕,因为取消了用于支付增加赠款的税收抵免。同样,在智利,这些补助几乎全部提供给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尽管在这

里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收益,因为减少奖学金资助可以抵消亏损)。但是,在纽约,额外资金的好处几乎全给了家庭收入在 8 万美元至 12.5 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因为低于这一收入水平学生的学费已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拨款获得了补贴。所以大部分资金都给予了这样一个收入阶层——他们在支付(公立院校)高等教育费用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很大困难。

政策经验

以收入为目标的免学费既有效又高效的关键不是把收费门槛提高。即使是一度非常热衷于“免费”的智利政府也迟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政府被迫将提供“免学费”的范围限制在 60% 收入最低家庭的学生。今年夏天,智利财政部(the Chilean Treasury Department)公布了扩大该计划的成本估算。在目前的状态下,按阶段划分的计划其成本将达到 6 070 亿比索(约合 9.5 亿美元)。若增加其余 40% 的家庭,其成本将增加 3 500 亿。也就是说,每个人免除的学费将超过 2 万亿比索,或者是 60% 最低收入家庭总成本的三倍。这一差额相当于 GDP 的 1.5%。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事实上,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参与度已经很高,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总之,有针对性的免除学费很有意义,但确实需要有的放矢。如果目标针对性削弱,该计划变得更加昂贵,效率也降低。显然,纽约的计划遭受的是目标不明确。加拿大的计划和(偶然性的)智利的计划基本正确。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区试行有针对性的免学费政策,掌握这些经验教训将相当重要。

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及预算削减

Doria Abdullah

马来西亚 UTM 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UTM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高级讲师、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doria@utmpace.edu.my 或 Doria.Abdullah@obhe.org

马来西亚大力投资教育。第三产业控制着教育预算的最大份额。公共资金直接拨给了国内 20 所公立大学。2007 年, 90% 的大学运营预算来自政府, 其余 10% 来自学费和其他自生收入。公共资金也通过奖学金、学生贷款和年度津贴间接分配给个别学生购买书籍、参考资料和宽带订阅。

自 2007 年以来, 马来西亚政府已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在公立大学财政预算中, 政府拨款目前已降至 70%, 其余 30% 的预算是通过自生收入来实现的。在过去两年中, 削减幅度尤为剧烈: 2017 年, 公立大学获得了 61.2 亿令吉的总拨款, 比 2016 年的 75.7 亿令吉减少了 19.23%。

这些大规模削减并未在马来西亚学术界受到欢迎。人们多次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削减预算的问题, 不仅包括公立大学的校长, 也包括民众, 他们对资源有限环境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表示担忧。

根本原因

人们很容易就把目前紧缩措施的缘由归咎于经济波动。石油价格波动和当地货币(令吉)贬值, 减少了总体收入和税收, 缩减了该部门的公共资金数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其他部门也未幸免于难: 例如, 医疗保健部门近年来也经历了资金缩减。

逐渐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是必要

的。在“U21 大学同盟”(Universitas 21) 针对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排名中, 马来西亚就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这个指标看, 在 5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1。然而, 在产出和科研影响、院校卓越以及毕业生就业能力方面, 马来西亚排名第 39 位。对于获得大量公共资金的部门, 回报不符合预期。援引基于成果的预算, 政府对其为公立大学的资金分配做出了合理解释, 促使它们在运营上更加高效。

事实上, 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部门已大大扩张。2012 年, 有 120 万学生参与高等教育学习, 到 2025 年, 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到 250 万人。未来十年预计将有两倍的增长, 增加公共资金以支持该领域并非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预算削减正处于一个关键和适当时期, 公立大学必须适应新的规范。

调整

在预算削减之前, 公立大学财务状况良好, 没有通过核心工作产生收入的压力。资金减少使所有职能都需要迅速改变: 从行政职能、旅行报销和事务管理的短期成本削减措施开始。接下来, 这些预算减少了国际教师招聘数量、学术人员流动和基础设施发展。再然后是出租和租赁校园资产、增加公共咨询服务并推动研发与行业的商业化。

提高学费可能是解决财务难题的捷径。但是, 高等教育部长已给出了个人保证: 不

会提高国内学生学费。大学正寻求一个解决方案，要求对学费进行审查，这将使它们逐渐增加费用，或将学费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就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国际学生支付全额学费，这激励大学增加国际学生的招生。

大学正在重新审视校友参与部门的功能，并启动更好的校友网络联结计划。遵循伊斯兰教原则，通过捐赠和宗教基金、资产捐赠和现金捐款，鼓励公众资助高等教育。大学还设立了私人机构，向市民提供基于市场汇率的全日制学术课程和各种职业课程。这些在其他地方很常见的举措正成为马来西亚公立大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教育部议程

高等教育部正利用预算削减推动两个转型议程。

第一个议程涉及治理。大学理事会曾是每所公立大学的仪式性或基本不工作的部门，现在则被赋予了加快决策过程的专门作用。理事会还进行年度评估，以评估其有效性。五所研究型大学：马来西亚大学（Universiti Malaya）、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以及马来西亚理工大学（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是第一批获得财务自主权的大学，这使得他们在学生入学、学术管理、人力资源和创收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第二个议程涉及支持大学财务可持续性的绩效指标和具体功能。副校长履行合同包括创收指标，这影响未来资金的拨付和整体业绩评估。其他战略功能包括：主管大学发

展的副校长，他与业务发展部门合作，为该院校开启资助机会；主管企业和社区事务的副校长，负责与工业界和社区的外部参与者进行战略合作，开展学术和科研合作。

未填补的差距

公立大学处于急剧升降的学习曲线上。教职员工和管理者觉得很难适应。改变心态和行为需要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明白需要更加高效和创新的创收方式，但却在实际执行上踌躇不前。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这样做的、最基本的企业家能力。学院和部门要规避风险，宁愿保持现有的举措，而不愿发展新的做事方式。

监管框架的变化非常令人担忧，这无法反应大学被给予的自主地位。为了创造更大的收入，大学必须更像商业实体一样运作。但是，公立大学是根据 1971 年《大学和大学院校法》（*th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2009 年修订）成立的，因此仍与传统的结构和投资挂钩。大学还必须在高等教育部、财政部和经济规划部（*the Economic Planning Unit*）要求的预算分配、采购和其他财务事宜上进行审批和填报登记。

预算削减将成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永久性举措。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目前的财务状况，转变公立大学，使公立大学不得不习惯于更精简和更高效的运作，同时维持或增加现有的学术和科研活动的拨款。此外，公立大学探索跨国教育未知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与私人 and 外国院校合作，通过创新的跨国教育模式，增加学术项目的入学机会。

又一个错失的良机？资助不足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学教授、中国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海外名师”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电子邮箱: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近提出的一系列预算改革只会加剧高等教育部门现有的资金问题。前任部长提出的一些最糟糕的削减现在已经被放弃,并承诺它们永远不会获得议会的批准。但很难否定一所主要的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的结论:尽管避免了此前政策可能带来的危机,但目前的一系列建议展现的是资助不足的高等教育另一个错失的良机。

澳大利亚政府对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资助在 1996~2006 年间下降了 4%,而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其成员国的高等教育经费同期平均增长了 49%。高等教育界有一种期待:新总理是一个所谓的改革者,他的竞选核心是国家需要优先考虑科学和创新,这将大幅提高高等教育和研究经费。近年来,随着医学领域至少获得两项诺贝尔奖,以及太阳能电池技术、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多个领域的国际领先成就,可以做出合理的预期:政府将取消此前的资金削减,为该部门提供充足资金并履行早些时候的承诺,以为全部的科研成本提供支持。例如,领先的研究型大学联盟——“澳洲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一直获得大部分科研经费,它们长期抱怨历届政府未能为开展研究提供全部所需资金,这意味着它们的研究预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提议改革

尽管有这种合理的期望,但教育部门对提出的措施感到失望,这些措施没有纠正过

去的失败,却可能使情况恶化。重要的改革是重新调整公共和私人债务比例之间的平衡,以支持国家以收入为条件的长期贷款计划。根据现有的安排,学生需承担学位费用的 42%,这个数额只有在学生符合具体条件时才会生效,包括:毕业、找工作、赚取高于年收入门槛的金额。一旦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毕业生要额外支付适量所得税,直到债务清除。根据新的安排,学生们将支付更多费用,在 2018 年到 2021 年间每年增加 1.82%,最终总增加 7.5%。这意味着从 2021 年起,学生将支付 46%而非 42%的学费。

向学生转嫁成本负担是否会阻碍一些学生入学,尤其是那些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这还有待观察。提议的改革能否使高等教育对一些学生群体,尤其是那些半工半读学生,具备较少的吸引力,甚至让他们望而却步?原来的资助计划制定者估计,这不会对学生债务有很大影响,学生在偿还贷款上只需多增加一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该计划大幅减少了开始贷款偿还的收入门槛——从 55 000 美元到 42 000 美元——尽管将债务收取率从 4%降至 1%意味着对大多数学生的影响相对较小。

除了学生贷款计划的变化之外,大学将以联邦补助金计划的“效率红利”形式直接削减约 4 亿澳元——两年内削减 3.842 亿澳元。这个所谓的效率衡量标准是减少资金投入的一种方便的委婉说法,并且增加了政府为研究的全部成本提供资金的风险。如果实

施的话，拟议的削减将意味着 2018 年政府资金总额下降 2.5%，并在 2019 年进一步下降 2.5%。据悉，从 2016~2017 学年开始的五年间，全套方案将使公共资金减少近 20 亿澳元。如果结合了调整大学拨款方式的变化，那么很显然，目的是让大学获得较少的生均经费，因此需要少花钱多办事。显然，这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事实上，这只会加剧大学已衰落了一段时间的状况。

非改革

在目前的一套提案中被遗弃的是 2014~15 年高等教育较早的解除管制预算中最糟糕的因素。在以前的提案中，高等教育部门总体上要削减 20% 左右的预算，实行学生债务实际利率（目前只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大学也可以自由收取高要求课程的费用。一些支持向某些课程灵活收取更高费用的副校长（大部分来自最富有的院校）可能会私底下感到很失望。但是这一领域的大部分人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些早已严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国家研究精力的措施已经被舍弃了。即使放弃这些措施只是承认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国会一直拒绝执行，所以避免了潜在的重大资金危机。

成功的问题

但是，尽管早先提案的最坏影响已经避免，新的预算措施还是没有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问题在于澳大利亚的大学过于成功，它们正因此受到惩罚。通过把自己转变成出口收入的主要引擎，现在每年从国际学生学费中获得 200 亿澳元的收入，大学已经被政府看作是摇钱树，可以随意赚钱。进一步的“效率红利”和全额研究费用的持续失败只会让大学进一步向国际学生赚取更多收入，从而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至少有一位副总理提出了这样的前景作为回应：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可能会取代国内学生。这个论点在过去并没有被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辩论的一部分被提出来。但事实上，四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入学者（在一些顶尖大学中为三分之一）是国际学生——这是全球任何主要高等教育系统的最高比例——可能首次遭到公众的反抗。在避免先前建议中最糟糕内容的同时，目前提出的“效率红利”将更多贷款的财政负担从国家转移到学生身上。此外，拨款机制的变化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只会恶化长期未能充分资助该行业的情况。

排名中的风暴：非洲视角

Damtew Teferra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高等教育教授、高等教育及培训发展领导人、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teferra@ukzn.ac.za;teferra@bc.edu

现在正是排名机构公布了它们对世界大学比较地位“调查结果”的时节。像往常一样，“最好的”大学仍然处于顶端，其余的则落在底部——非洲大学尤其如此。这些“排名者”继续着他们的事业，有些人胆大妄为，但往往没有充分关注其方法的准确性、真实性或完整性，在非洲尤为如此，即便是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

事实 vs. 认知

过去三年中，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在学术生产力方面排名第一，这是由高等教育和培训部 (the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进行评估的。该部门使用精心衡量科研和学术成果的指标进行排序。然而，根据最新发布的 QS 排名——该排名将 60% 的评估标准分配给学术声誉，大学目前位于其他六所南非大学之后。这表明了数据和基于声誉的可疑评估之间所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

声誉建设：数据细读

QS 排名是涵盖六个指标的调查回复和数据的结合，编制并加权以得出最终得分。它声称，超过 7 万名学者和 3 万名雇主通过 QS 全球调查为排名做出了贡献。QS 指出，在 950 所院校被排名前，它从 1 030 万篇论

文中分析了 9 900 万条引文。

《泰晤士高等教育》指出，其方法论是一项独特的研究，含有“调查问卷，向来自 137 个国家的 10 500 名学者询问他们认为在教学和科研上表现最好的大学。”它声称学术声誉调查“使用联合国的数据作为指导，以确保答复覆盖面尽可能代表学术界的回答。”

《泰晤士高等教育》还声称，在国家被过度重视或重视不足的情况下，答复的重点是“更加密切地反映学者的实际地理分布”，给排名参数的变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学术界”与“学者的地理分布”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混淆，对“学者”或“学术”没有明确的定义，中国、印度和巴西可能拥有“学者”的数量最多，也因此具备更多的学术性，但它们并未在排名中名列前茅。

《泰晤士高等教育》表示，只有 2% 的调查参与者是非洲人，并被估计来自非洲大陆。由于非洲大约 50% 的研究是在南非进行的，人们可能会认为非洲其他地区的调查参与者人数减少到 1%。约 100 名在南非以外地区的非洲学者，参与了“平均分布在各学科之间”的声誉指数。因此，对于排名中所考虑的 11 个学科，这意味着每个学科中约有 10 位调查参与者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其参与者在问卷调查中占比分别为 5% 和 3%。

排名指标

事实上,排名主要有关于声誉。根据 QS 的说法,声誉是一个 40%来自学者回答,20%来自雇主回答的计算结果。如果一所院校在这两个基于认知的指数上得分较高,那么这所院校的排名就会提高。《泰晤士高等教育》声誉指数完全基于一项认知调查,要求回答者“列出不超过 15 所他们认为的最好大学”。

世界,特别是非洲,为什么会忽视这些排名呢?原因很多。让我们考虑一下 QS 排名,这对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有相当的影响。非洲高等教育部门无一例外地正在大规模扩张,就像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这导致了较高的学生人数比例,可能迫使院校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提高它们在排名中的地位对其来说很重要的话,要么冻结扩张,要么提高学者人数。增加学者的数量将需要大量的投资、创造性的政策和长期的承诺,很少有院校可以做到。

排名中使用的另一个参数是国际教师比例和国际学生比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和博茨瓦纳,在某种程度上纳米比亚是吸引国际教师的唯一国家,大部分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这仍然是非洲其他地区的梦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同样,提高国际学生比例也是 QS 和其他人使用的另一个排名标准。吸引国际学生的非洲国家非常少,包括南非、加纳、肯尼亚和乌干达。几乎所有这些国际学生来自其他非洲国家,除了南非。即使海外留学,也只要一两个学期。

这些排名的性质是这样的,顶层的院校大多来自美国,年复一年。在回顾“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行榜时,对全球榜上中下游

人士的评价也可能是相同的,有些人可能已经上升了一个档次,其他人则下降了一个档次。强调以声誉为基础的标准并不影响最高层建立者的地位。这些院校往往免受罢工、财政压力、内部纷争或发展中国家院校面临的其他严峻挑战所带来的困扰。

操纵排名

一些自称为数据分析师的企业已经开始“帮助”非洲院校在排名上的表现。东非的一所旗舰大学被怀疑采取了这种做法,据报道学校为这种做法已经付出了高昂的服务费。它们现在已开始向院校出售其专业知识,声称要提供一个收费的“品牌”服务。这一新兴现象为这种已经存在缺陷的做法(利益冲突)提供了另一个转折点。

这些冒充服务提供者的组织(通常在院校管理人员的重大会议中),其煞有气势的定位只不过是一种骗局。院校应该有效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而不是为了提高排名而追求捷径。

追求质量制度

全球高等教育市场正在爆炸式增长,带来了许多新/老善意者和可疑的参与者及提供者。因此,教育提供的范围、模式、平台和实践已经大大地多样化,越来越需要可靠的质量体系。

因此,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非洲正在建立许多质量机构。例如,非洲一半以上的国家现在都有国家主管部门来管理高等教育质量——且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随着高等教育部门不断多元化,全球层面对此类组织的需求也非常大。排名机构应该是全球层面的质量把关者;但它们迄今还没有达到这一

期望。

一年前，我接到南非一所大学副校长的电话，他建议开展协调工作，退出国家院校的排名。该提议旨在鼓励南非所有大学拒绝参与排名，而非将所有的资源、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更多相关的问题上。作为南非首屈一指的大学，罗兹（Rhodes）大学已拒绝参与加排名，所以已经有了先例。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彼得·沃尔高等研究学院（the Peter Wal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的支持下，2017年5月，在温哥华举行了一个国际排名圆桌会议。该会议仔细讨论了大学排名的范围和意义，并提出了今后的具体行动和干预措施。

结语

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观点，“声誉榜只不过是主观判断而已。”QS 还指出，60% 的分数依赖声誉，因此是主观的。然而令人沮丧的是，高等教育世界（以及其他领域）仍然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使用有缺陷或错误工具的自我服务。

排名不会很快消失。事实上，随着更多排名的加入，它们更有可能产生更多喧闹的声音，以确保其生存和影响力。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掠夺者的扩散可能是其巨大影响力结束的开始，因为院校通常选择特定排名者，它们将该院校排在有利位置。最后，排名位次最高和最低的院校将继续在场外观看“仪式”，而暴风雨仍在排名中持续。

科学研究：非洲大学“迷失的使命”

Harris Andoh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评估与科技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研究政策专家

电子邮箱: andoharris@gmail.com

非洲大学科研使命的历史背景

英国政府在过去成立了几个委员会，探讨作为英殖民地非洲高等教育的需要。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八个著名的委员会和咨询机构中（从 1841 年的马登委员会[the Madden Commission]到 1945 年的阿斯奎斯委员会[the Asquith Commission]），值得注意的是，夏侬委员会[the Channon Commission]（1943）是第一个提到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大学需要把科研作为核心功能的。因此，科研成为后来由殖民地和国家政府建立的大学使命的一部分。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在英国殖民地非洲建立大学以来，当地举行了几次会议来讨论非洲大学的概念及其使命。这些会议汇集了整个非洲高等教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评估了大学历史上每个阶段的作用和相关性。在 2000 年以前举行的四次主要会议（1961 年亚的斯亚贝巴会议，1962 年 Tananarive 会议，1972 年阿克拉研讨会，1980 年 Tananarive 会议）中，只有 1962 年的会议强调科研是非洲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这些国立大学成立几年后，本国大多数政府都被推翻了。军政府干预大学的管理，任命其政治分支机构承担管理职务，在某些情况下指导大学校长如何管理大学。虽然大学有开展科研的意愿，但缺乏必要的资金，

缺少一大批科研人员和开展科研的基础设施。

当研究成为“迷失的使命”

当非洲大学在后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们有望知道科研的内容，并将其发现提供给政府和社会，帮助解决社会和发展问题。然而，独立后的几年里，政府大量参与大学的管理。这些政府并没有提升大学的科研议程，而是进一步推进了大学应该如何运作的民族主义观点。在当时，这些大学的科研使命“迷失”了：许多非洲大学及其政府并没有把科研视为重点，导致研究产出很低。研究生科研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学只是完成了为国家培养人力资源的任务。1960 年到 2000 年，“迷失的科研使命”时期——这些非洲大学的被贴上了“教学型”、“职业型”，然后是“发展型”的标签。在此期间，它们从未被称为“研究型大学”。

这一“迷失的科研使命”时期的证据，可以在该时期非洲大陆较少的研究成果中找到。来自汤森路透 SCI 引文索引的数据显示，除南非以外，非洲在 1985 年至 2000 年间出版了 1 646 种出版物，2000 至 2015 年期间在科学领域出版了 5 534 种出版物。这些数字远低于同期全球科学领域的总出版量——44 963 737（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另外，在“迷失的科研使命”时期，除南非以外的所

有非洲国家的国内研发总额（GERD）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低于 0.2%，且在大多数非洲国家这一比例甚至不存在。

在这个“迷失的科研使命”阶段，许多非洲大学被国家政府委托培训技术工人，包括健康助理、秘书，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此外，科研人员大多对有利于在大学内晋升的研究感兴趣，而这些研究所需要推广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在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很难向公众传播，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保密的。有证据表明，大学也受到独裁政府的围攻，这些政府不喜欢研究人员发表任何违背官方立场的东西。这种威权主义的倾向迫使大学把注意力放在知识上。

重获“科研使命”

自 2000 年以来，非洲大学已转变了政策，现在也接受了其使命的全球变化。大学排名、国际化和大众化问题的到来，都促使大学管理者和国家政府重新考虑“迷失”的科研使命。例如，加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hana）在确定其新使命时指出：“它希望通过尖端研究向一些已取得世界一流地位的世界知名大学靠拢”。

自 2004 年以来，大学已开始投入更多努力，这体现在其附属机构的科研项目以及在国际期刊发文上。通过招聘更多的教授来承担研究型毕业生的指导以及建立实验室，研究生学习也得到了提升，特别是在硕士和博

士阶段。

为了增加科研产出，大多数大学也设立了研发办公室以及研究院。研发办公室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主要集中在旗舰大学，如加纳大学或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badan）。相信这些科研机构将会增加大学科研的重点，提高科研质量并吸引资金。这些办公室的任务也是帮助促进和改善与其他科研机构以及西方捐助者的关系。

非洲大学新的科研使命迫使它们制定政策，通过改进科研工作来指导它们。此外，大学还为其学术和科研人员制定了研究伦理和一般性的研究指导方针。

结语

由于军事独裁时期，非洲大学的科研滞后了四十年，而欧洲、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对口大学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导致大多数非洲大学在国际排名上的低位次。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型大学，非洲大学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包括缺乏资金、科研人员培训不足、缺乏适当的科研评估结构，以及需要发展目前尚不存在的研究问责制度和文。

此外，非洲大学需要确定大学的科研是什么，以及它们希望优先考虑哪些研究（基础和应用）以满足其科研使命。科研成果应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政府和社区，并有助于发展和知识经济。

印度：世界一流大学

Philip G. Altbach、Jamil Salmi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大学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曾任职于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不久前, 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 (Pranab Mukherjee) 宣布: “如果我们在未来四至五年内为 10 至 15 所高校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些高校在未来几年肯定会跻身全球学术排行榜前 100 名。” 2016 年下半年, 人力资源发展部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法规草案, 以建立 20 所世界一流大学——10 所公立大学和 10 所私立大学。但不幸的是, 这一值得赞赏的目标, 很难短期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 即便该目标的实现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是为什么呢?

印度的高等教育环境

几十年来, 印度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普遍资金不足, 尤其是考虑到学生人数的大幅增长。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 教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 仅次于巴西。但就科研支出而言, 印度处于最低水平, 仅占 GDP 的 0.8%。在金砖国家适龄人群中, 印度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所占百分比最低。虽然现在印度已是继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高等教育系统, 但满足公众需求和政府自身目标的扩张压力是巨大的。

高等教育体系组织欠佳, 无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没有一个印度州政府拥有在

国家层面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景, 也没有提供能够保证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资金。中央大学资金充足, 无需承担监督印度 3.6 万所州立学校的巨大且全球独特的责任。

过去, 当印度想要创建新且具备创新精神的高等教育院校时, 全新的学校开始建立, 如印度理工学院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塔塔基础研究院 (the 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印度管理学院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 等等。印度的规划者们不想克服现有大学看似无法克服的治理问题。印度的规章制度规定, 合格的大学应该有大约 2 万名学生。虽然国际数据显示, 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数量都在这一范围内, 但许多其他大学却没有达标, 而这一指导方针将把印度理工学院——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具备快速发展精神和治理的印度院校排除在外。

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仔细的思考、规划和长期的大量资金投入。如果全球排名中的认可是一个目标, 那么挑战更为巨大, 因为排名是个移动的目标, 竞争是激烈的。例如, 俄罗斯政府正在资助一项旨在 2020 年前使五所俄罗斯大学进入前 100 名的计划。每年向 15 所一流大学提供超过 4 亿美元的资助。日本最近开始了“超级全球大学项

目”(Super Global Universities Project)。中国继续在顶尖大学上花费巨资,其中两所首次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100 位。印度是世界一流大学群体的迟到者,它不会花费太多资源来取得进步。如果资金统一分配,一年内将达到 500 亿卢比(约 7 500 万美元),或者是每所院校每年可能达到 5 千万卢比(约 100 万美元)。这些金额完全不足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世界一流的蓝图

我们分析了在《通向学术卓越之路:世界一流研究大学的建成》(*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World Bank, 2011)一书中取得巨大成功的 10 所新大学的经验。我们发现所有学校都有一些共同点。以下列表为建立成功的顶级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必要但可能不充分的条件。

创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所需的关键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充足的财政资源,以确保学校能够开始运行并保持卓越;平衡的治理模式,包括学者的重大参与,但不是学者的全面控制;稳固的领导,不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校长,而且是能够执行大学使命的专业行政人员;不受政府或私人部门干预的自主权,但可以承担外部机构合理范围的问责;教学、科研和出版的学术自由;致力于大学使命(包括教学)的顶尖学术人员,他们获得适当的薪酬和职业阶梯;高素质和积极主动的学生;对于追求卓越的坚定承诺。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能够在追求卓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加速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在升级现有大学或建立新院校时广泛依赖侨民。正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经验所表明,将大量海外学者带回原籍国是一种迅速建立一所机构的学术力量的有效方法。

第二个要素是引入重要的课程和教学创新。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第一所美式大学,与现有的按照英国模式运作的院校不同。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in Moscow)是俄罗斯第一批提供现代化课程的院校之一,它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支持性的数字图书馆。这些创新特征是“后发优势”的一部分,对于那些需要吸引学生远离现有大学并使他们冒险参加“未知”计划的新院校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个因素是使用标杆作为指导方法来指导院校的升级工作。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首先将其战略规划工作与中国领先的大学进行了仔细比较,然后将其与同行的外国大学进行对比。正如香港科技大学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实例所证明的那样,专注于利基领域是另一种更快获得一批顶级研究人员的合适方式。许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都把科学技术作为唯一的重点。这些领域当然是重要的,它们会在排名中带来利益,因为它们会产生许多期刊文章。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越来越具备相关性,并且被那些排名很重视的引文指标所认可。当代世界需要把重点放在知识的各个方面,以解决地球上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能源、食物、健康等)。

印度的现实

在副校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上,印度并没有从政府或政治参与中给予高校重要的自主权。事实上,大多数观察家指出,高

等教育的许多方面已经被政治化了，所提出的指导方针表明，大学治理方面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印度的“保留系统”（reservation system）将学生入学和教职工任用中一半的名额留给了特定弱势人口群体，该系统也许对教学为主的学院有效并具有积极效果，但该系统并未允许发展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拟议的指导方针表明，“预约系统”将保持原样。

印度有一定的优势。在大部分高等教育中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和科研用语，这使得印度处于全球语言主流。印度不乏缺乏训练有

素的国内外研究人员。一个真正令人兴奋和计划周全的学术发展可以吸引印度侨民——但其前提是具备适当的学术条件和灵活的治理安排，且薪酬符合国际水准。

印度的现状和过去的努力表明，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可能举步维艰。但是，在国家主席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的规划和多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在印度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拟议的资金水平和实施准则使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足够的数量：是时候关注巴基斯坦研究人员的素质了

Muhammad Z. Ahme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热带研究和教育中心 (the Trop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电子邮箱: zaheerento@gmail.com

尽管许多亚洲国家最近遇到财政问题，但巴基斯坦的经济下滑尤其显著，这与许多其他因素相关，包括恐怖主义发生率增加、腐败普遍、执法不力、对私人投资和外援的阻碍、政治动荡、能源短缺和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自 2000 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4%，这不足以跟上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尽管增长率相对较低，巴基斯坦研发基金和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在同一时期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巴基斯坦真的在进步吗？

为解决巴基斯坦科研部门的整体推进问题，通过计算过去十五年间与博士毕业生人数相关的巴基斯坦作者的科研文章数量，我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了一项分析，以定量评估科研成果。巴基斯坦研究所附属机构在 1985 年至 2015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增加了 687%。同样，在 1947 年至 2014 年间，巴基斯坦博士研究生人数增加了 248%。此外，巴基斯坦科研文章的引用在过去 30 年中增长了 419%。期刊影响因子通常预示着文章的质量，《科学》(Science) 与《自然》(Nature) 是刊登基础科学研究文章中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但不幸的是，大多数来自巴基斯坦的研究文章都发表在低质量的研究期刊 (即低影响因子期刊) 上。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巴基斯坦科学研究人员仅在《科学》杂志共发表了 9 篇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11 篇文章。但即使是这些相对较低的数字，与 1985 年至 1999 年期间相比，定期出版率也有所提高 (《科学》杂志中提高了 350%，《自然》杂志中提高了 267%)。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研究文章的总发表率在同一时期增长了 687%。

回顾每所高等教育院校发表的文章的比例也是有启发的。在巴基斯坦，每所院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出版率分别是 0.13 和 0.23，印度为 0.18 和 0.48，美国则是 4.2 和 5.6。考虑到这一差距，巴基斯坦试图增加当地影响因子期刊的数量，从 1999 年的两种这样的期刊增至目前的 11 种 (最大影响因子为 1)。因此，尽管研究期刊数量增加，但对其质量的认知仍然很低。

我为巴基斯坦科研人员、学术机构和大学管理部门提出了三个相关建议，这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科研标准。

亟待摆脱腐败教育文化

剽窃是巴基斯坦低质量学术研究的主要原因。通过搜索易于获取的文献，作者经常剽窃他人的想法，然后巧妙地对这一想法进行改动，以尽量减少抄袭的痕迹。巴基斯坦学生正学习在易于获取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技巧，然后“操纵”文章的引用。有人可能会质疑学生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指责。由于巴基斯坦的学术文化阻碍了独立思考，并迫使学生盲目地服从于他们的导师，巴基斯坦的科研环境是由不称职的教师组成的，他们在监管学生上没有受合适的训练——因此，教师应该对蔓延的剽窃负责。实际上，导师要求学生发表论文的压力迫使学生们进行学术造假，这使得在高质量的期刊中发表论文极为困难。如果巴基斯坦的科研人员花费大量时间剽窃论文，并且利用其关系网络聪明地通过密集的评审程序，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呢？导致学生作弊的原因是教师缺乏在学生学业生涯早期阶段就科研伦理对其进行教育的能力。

另外，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偏袒行为十分普遍。充分了解你的导师和考官很可能会保证你的毕业。巴基斯坦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基础设施来执行反剽窃法律，避免科学中的政治和偏袒。需要举办伦理讲座和培训班，传播剽窃意识，在学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早期阶段至少要开设一门与学术伦理相关的必修课。

最近，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Pakistani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将 23 名学术研究人员列入剽窃指控黑名单。但是，并未按照抄袭政策对这些黑名单学者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继续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其中一位是著名的研究员，曾任英国博士后，目前在巴基斯坦担任教授和研究中心主任。由于巴基斯坦学术文化普遍腐败，黑名单对这样备受瞩目的人士的声誉和职业没有任何影响。巴基斯坦研发基金的一部分应被编入

预算，以执行反抄袭规则，就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预算一样。迫切需要一个拥有专家队伍的基础设施来执行反剽窃法律；为他人树立榜样，有罪当事人的科研和教学权力应被大学撤销。

修订教师选取标准

科研标准只能通过投入更多资源、培养更好的科研人员和聘请训练有素的教员，在长期内得以改善。目前，在巴基斯坦聘请的助理教授中，大部分都没有博士后工作经验。在发达国家，由于博士后职位在专业领域提供了额外的科研培训，使得教职人员在开始任教之前获得必要的技能，所以博士后经验是必须的。巴基斯坦需要修改其教师招聘程序。招聘教师的高选拔标准和透明度对于拯救巴基斯坦的学术界至关重要。与其聘用所有博士毕业生为助理教授，为什么不让他们作为博士后工作几年后，再考虑担任教职呢？这将带来更有效的筛选过程。在那些被选为教师角色的人员中，任期（和进一步晋升）只能根据科研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出版物的数量来进行判定。

吸引海外毕业的巴基斯坦研究人员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自 2003 年以来已开展了海外奖学金项目，并给予 7 537 名学生奖学金到世界各地学习。这是高等教育委员会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这些奖学金的目的是把学生送到国外去接受培训，然后回国服务（学生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归国是一项强制性要求）。但是，许多高等教育委员会决策者不了解博士后研究的概念。法院正在

追查 300 至 400 宗案件，针对的是那些在完成博士后工作后拒绝返回巴基斯坦的学者。现有奖学金的持续时间不足以让学生接受充分的培训，如可能的话，高等教育委员必须考虑延长时间限制。此外，如果学者选择留在国外，他们可能很容易被聘为巴基斯坦大学的兼职教师，或者远程指导巴基斯坦学生，

和/或担任高等教育委员项目的联合首席调查员。

总的来说，巴基斯坦的科研环境亟需改变。尽管许多这些变化必须由大学和政府机构来实施，但有些必须经由科研人员自己实行。

学生多样性与印度高等教育包容性的挑战

Nidhi S. Sabharwal、C.M. Malish

Nidhi S. Sabharwal: 印度新德里国立教育规划与管理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副教授

电子邮箱: nidhis@nuepa.org

C.M. Malish: 印度新德里国立教育规划与管理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andmalishcm@nuepa.org

印度的高等教育部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2016 年, 印度招生 3 400 万人, 毛入学率达到 24%, 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种大众化伴随着学生群体的日益多样化。许多来自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学生, 如原来的“贱民”(untouchable) 以及来自贫困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其他低等阶层的学生, 已经进入教育领域, 这改变了印度校园的社会群体构成。今天, 大部分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仍然来自特权阶层, 而大多数学生属于弱势群体。这是紧张局势的根源, 并加剧了解决高等教育校园日益增多的学生多样性问题的挑战。

理解印度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已经完成了有关多样性和歧视问题的重要研究。研究基于的大规模实证数据, 包括对 3 200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 对 200 名教师的访谈以及与印度各省高等院校学生进行的 70 次焦点小组讨论。这项研究是印度有关该主题首个详细的实证分析之一。研究表明, 需要将这一现象划分为不同但相关的阶段, 以便理解

多样性问题并启动发展包容性校园的步骤。以下内容将描述研究中得出的分类。

阶段 I: 社会多样性

社会多样性是学生多样性最明显的形式, 可以量化和衡量。社会多样性反映在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入学学生的相对份额方面: 表列种姓 (SCs); 表列部落 (ST); 其他落后阶层 (OBCs); 和更高的种姓。经验证据表明, 社会弱势群体 (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 的学生比例有所增加, 使得校园更加多样化。我们认为学生成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严格执行保留政策和配额制度。

但是, 这些趋势不能一概而论。根据竞争性考试的选择性录取政策, 精英院校往往招收大量来自特权群体 (高等级) 的学生。这类校园仍不太多样化, 且继续根据不同学科的种姓和族裔隔离学生。例如, 在竞争性考试招生录取中, 高等级群体学生所占比例超过 60%, 而属于低等级群体的学生 (如表列种姓) 比例低于 9%。由于这些院校大多精于 STEM 科目, 所以选择性招生政策也对学习项目的选择、毕业后的就业和收入产生重

大影响。

阶段 II：学术多样性

研究第一阶段探讨的是入学阶段的多样性问题，研究第二阶段则反映了课堂内部发生的情况以及对学术成果的影响。由于学前教育条件的差异，弱势群体的学生在与特权背景的学生竞争时严重受限。许多弱势群体学生是家族中进入上大学的第一代人，他们来自政府学校，教学语言是地区性语言，且获得的入大学前支持机会相当有限，难以获得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必要学术水平。

大学教师的态度并非总是有利于解决弱势群体学生面临的困难。许多教师倾向于认为，弱势群体学生人数的增加是导致学术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对于他们来说，以前的“贱民”在课堂上是“不可教的”。由此产生的低水平师生学术接触对弱势群体学生的学术整合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弱势群体的学生被录取到高等教育院校，也不能与其他人竞争，除非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学习条件。换句话说，即使入学阶段的多样性已经实现，第二阶段（入学后）的多样性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阶段 III：社会包容性

多样性的第三个阶段反映了接纳弱势学生的校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包容的气氛。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会群体认同和学术差异成为校园偏见和歧视的根源。

种姓和种族歧视带来的偏见和成见很常

见，并导致了课堂内外出现明显和隐蔽的歧视形式。教师为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更少的课内外时间讨论学术问题，不鼓励他们组织或参与学术和非学术性活动。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在与管理人士的互动中面临着被羞辱的经历。诸如“通过保留获得利益的政府特殊学生（sarkari damad）”的贬损言论，将其标记为“保留范畴”，嘲笑他们是通常的歧视性做法，他们的习惯、口音、穿衣模式等在校园里受到嘲笑，对歧视的恐惧感使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学生形成基于身份的同伴群体，进一步将他们与主流隔离开来。

虽然有促进多样性和保护学生免受歧视的院校机制，但许多安排并不能有效运作。这主要是由于教师和学术管理者对多样性和歧视问题缺乏敏感性。毫无疑问，歧视性做法会疏远弱势群体的学生，并导致社会排斥。学生感到不受欢迎，校园仍不具备包容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实现个人潜力和实现包容性卓越带来了重大挑战。

结语

可以说，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与院校应对渐增的学生多样性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将多样性分为不同阶段，并在每个阶段确定问题，有助于确定在印度发展包容性校园的干预措施和策略。院校领导和管理者需要了解不断增长的学生多样性的动态，并认识到多元化是一种资产，而非是在印度构建具有社会包容性校园的累赘。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扩张的矛盾

Eldho Mathews

印度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南印度国际化高等教育部主任

电子邮箱: eldhomathews@gmail.com

关于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相对优点的辩论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两个部门在该国的发展中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目前,印度有 25% 以上的中小学是私立的。在过去十年中,它们的份额一直在稳步增加。出于很多原因,包括教学质量、更好的资源、英语授课、准时性等,许多中产阶级的印度家长更喜欢让其小孩在私立学校而非政府(公立)学校上学。

就高等学校层面的教育而言,虽然有关院校发展的各种趋势几乎完全相同(如上所述),但是学生在争取院校录取的选择上却存在显著差异。比起纯粹的私立/不受资助的学校,大多数学生和家长仍然偏爱政府和政府援助的私立院校。

印度有着极其复杂的且通常令人困惑的高等教育体系。印度有着不同类型的院校,如:中央大学、州立大学、开放大学、私立大学、等同大学(deemed university,即“被认为等同于大学”的机构,中央政府根据 1956 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法》[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Act]第 3 条公开承认的院校),以及其他可授予学位得院校。此外,还有中央和州立大学的附属和构成本科院校,被称为学院。学院可以提供学位课程,但无权自己授予学位。

私立院校日益发展的角色及一些错误的统括

在印度高等教育招生和院校的大规模扩张上,私立无资助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最新官方统计,印度有 777 所大学。其中,261 所是私立大学。在 38 498 所本科院校中,77% 是私立院校。印度专业高等教育院校在过去 20 年中的大规模扩张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增长。印度高等教育入学总数中近 20% 的人就读于专业学科,工程和技术是最受欢迎的领域。

由于目前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仅为 28% (按 18~22 岁年龄群体计算),供求差距将增加,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最近,著名的公立印度管理研究所勒克瑙分校前主任普里坦·幸格(Pritam Singh)对印度私立商学院的状况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评论:“虽然某些私立学院已成功摆脱了原有的偏见并成为高质量的院校,但现在仍存在一些令私营部门倍感困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私立院校的所有者认为他们是企业而不是教育机构。他们更重视基础设施而不是研究工作,教师素质糟糕。高质量的教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因为这些院校给出的薪酬不高,或是不给予老师科研自主性和自由。

这一评论也与私立大学和私立无资助学院的发展相关。2009 年,人力资源发展部

Tandon 委员会 (Tandon Committee) 的报告强调了有关许多私立大学的观点:

- 科研被忽视;
- 收取额外的入学费用, 违反管理机构的准则, 这对入学和公平产生不利影响;
- 家庭成员被任命为信托负责人或主席, 并被赋予执行职能, 最终会损害各院校的自主权;
- 大学是以在世的创始人/受托人的名字命名的, 这种做法违背所有的道德和文化规范, 且极不寻常。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例外, 例如: 博拉技术与科学学院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普梅吉大学 (Azim Premji University)、曼尼帕大学 (Manipal University) 以及其他一些院校对印度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质量做出了贡献。这些院校脱颖而出, 主要是因为其课程、基础设施、行业伙伴关系和教师素质。

与公立院校相比, 私立院校享有相当的学术和行政自主权。但事实上, 只有少数学校足够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能够为教师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 吸引国内外一流公立院校的优秀人才。大多数著名的私立院校在建立和维护国际和行业伙伴关系、确保就业, 提供相关课程等方面远远领先于许多公立院校。

对学生选择的影响

尽管私立大学和无资助学院数量越来越多, 但学生们仍然更喜欢公立大学和政府资助的院校, 这体现在全国各地私人补习机构的增加上, 因为这有助于学生进入著名的公立院校。在印度, 80% 以上的研究生都在公立院校。公立院校的主要优势是合理的学费和生活成本、自由的校园氛围、校园多样化、

相对较强的学术课程等。进入著名的公立院校存在着巨大的供需差距, 如印度技术研究所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等公立院校, 印度尼赫鲁大学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等知名中央大学, 以及由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 (the 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资助的科研院所等, 所以竞争相当激烈。

人们偏好公立院校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私立大学和无资助学院都是以商业为导向的。这显然体现在它们的课程报价中, 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同样也体现在它们收取的费用上。这些院校大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营销和广告, 以吸引学生。大多数私立院校缺乏民主选举产生的协会, 这使学生和教师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虽然政府和私立院校都受到质量教师低下的影响, 但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缺乏责任感是大多数私立院校的一个特点。

结语

印度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在过去二十年中探索了新的增长和发展道路。然而, 这一行业需要更多慷慨慈善家而不是那些把教育视为商品的商业导向行为者的投资。同时, 还要务必注意, 把院校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等类别的分类适用于公立和私立院校。公立院校, 特别是二线城市和小城镇的高校, 需要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质量。公立和私立院校都有相对的优势和弱点, 因此可以在以下方面相互学习: 学费的可负担性、师资保留、学术和行政自主、国际化、言论自由、教师和学生的多样性、就业、基础设施和入学程序等。

注: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东亚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杨锐

中国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育学院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跨国与国际交流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箱: yangrui@hku.hk

新一轮大学排名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 东亚正迅速成为下一个高等教育超级力量。以其独特的传统, 东亚试图将占据主导地位几百年的西方的大学概念本土化。东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已在奋力探索把西方传统与自身相结合模式。这一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 与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达成一致意见远比以前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本文指出了香港研究资助局 (the 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最近一项研究报告的结果, 题为《整合中西高等教育传统: 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比较分析》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Traditions: A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of the Quest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751313H)。

近期的发展及其评估

东亚高等教育体系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快速提高。整个地区建立了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科学和创新区域。虽然日本一直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 但中国大陆、韩国和新加坡的科研成果也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台湾也不甘落后。在院校层面, 大学严格把全球质量研究作为其绩效标准。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比,

这种发展看起来更为显著。

然而, 在评估未来发展时, 人们可能会更加怀疑。对某些而言, 东亚大学正处于其发展最激动人心的阶段, 不断进取, 加入了世界顶尖大学联盟。对其他人来说, 尽管东亚大学在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它们总体而言还是落后于西方最好的大学。总的来说, 东亚“世界一流”地位这一概念是模仿性的而非创造性的。金融和其他资源, 再加上一些创新战略, 只能带来现有的成就。一种“玻璃天花板”即将到来。

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已被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所压倒。缺乏重视传统对当代发展影响的文化观点。有趣的是,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在论证中都引用了东亚的传统文化。同样有趣的是, 外部观察者通常会表达出极端观点: 对于该地区的研究人员来说, 收益和损失似乎更加真实。然而, 他们也没能把自己的大学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进行理论化。他们对这样的想法感到自豪, 即东亚大学并不认为西方模式就是卓越模式。

缩小的差距

东亚的传统高等教育关注世俗事务。实质的道德和政治关注比形而上学的投机活动更受青睐, 其关注点在于治国方略和道德而非逻辑。古代的东亚高等教育机构是为了统治者而建立的, 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形成了

鲜明对比。上个世纪之交，东亚社会开始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化，作为西方学术在国家“救亡”和东移的背景下广泛的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从一开始，东亚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导致了持续的冲突，并为未来制造了麻烦。

东亚独特的文化根源和传统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理念背后的核心西方价值观的运作。东亚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两种不兼容的强大价值体系的共存。西方理念只是因其实用性而得以采用。人们经常尝试将西方大学理念本土化，各个社会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却少有成功。这就解释了为何科学技术的成就远远超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正是东亚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然而，东亚长达一个世纪的艰苦工作已开始取得成果。定义大学的价值观正逐渐在整个地区扎根，最明显的是在个人层面。我的研究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承认其所属院校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即使是那些担心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并呼吁“求真相和自由”的人，也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种进步有助于缩小西方和东亚在大学理念上的传统差距。它质疑主流观点，因为主流观点认为东亚高等教育发展陷入僵局是由于完全缺乏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

文化尝试

作为后来者，东亚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追赶西方的渴望一直是热切的。所有参与者都经常提及的主要全球大学，无一例外都是西方院校。在谈及他们的国际网络、战略合作伙伴和全球排名时，听到他们提到西方大学是件常事。所有参与者在谈话中都对西方社会有着丰富的理解，这一事实必须在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当代东亚社会和

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西方学习已成为东亚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谈论教育时，东亚人已不可能不提西方了。

东亚的高等教育精英和学者认为，传统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我的实地工作反复验证了这种信心。东亚的思想传统有其优势，对大学理念有很大的贡献。经过一个多世纪向西方的艰辛学习之后，东亚人现在已处于有利位置了。他们灵活开放的视角使其能够认识到相对的两极是动力，看到矛盾中蕴藏的机会。他们务实的生活方式使其能够使用任何有用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不必在东亚和西方的大学模式中做出选择：他们可以同时使用并灵活应用这两种模式。

这两种传统都深深融入了东亚精英大学的日常运作中。东亚正在进行一种文化尝试，这种尝试已初露希望。东亚大学似乎越来越能够“把伤疤变成明星（turn scars into stars）”。与他们声名卓著的西方同伴不同，东亚学术精英对西方及其自己的社会都了如指掌。虽然西方大学主要在单一文化环境下运作，但东亚的旗舰大学至少在东亚和西方的组合文化中发挥作用。这样的组合具有全球意义且史无前例。

结语

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东亚仍取得了巨大进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可能通过融合西方和传统文化价值而进一步发展。东亚的顶尖大学正在探索一条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未来发展道路。它们的尝试表明，在视为是相互排斥的东亚和西方大学理念之间达成平衡是有可能的。虽然预测东亚的成功还为时过早，但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希望的。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缓慢路径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电子邮箱: yy241504@foxmail.com

通识教育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主题。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拓宽学生的常识，扩展他们的世界观，增强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许多大学已经推出了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而其他大学则已采取措施改善已经开始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有着悠久的历史。1949 年以前，大学教育主要是通识教育，因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聘用高层次专业化劳动力的需求有限。1949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大学建立了专业教育模式，以培养专业化的人才队伍。这种模式对中国高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主要的教育模式。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改革过于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已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任务，该模式（主要）由必修课组成。这个刚性模型是根据计划经济体系建立的。但鉴于目前的改革运动，导致新兴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需要变得更加灵活。早期改革高等教育的尝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一些大学采用了选修和学分制度，为通识教育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一些大学，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开始提供文化素质课程或讲座。这些课程或讲座的主要内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最新的文化发展，特别强调中国经典。

一流综合性大学是通识教育的先驱

21 世纪之交，一些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开发紧密结合的通识教育模式。例如，1998 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一所专门从事通识教育的本科学院，一开始命名为“基础学科教育学院”；2006 年，更名为匡亚明学院，以纪念前任校长。2001 年，北京大学启动了“元培计划”（也是以前任校长的名字命名），在大学前两年为少数新生提供不分专业的通识教育。从 2002 年开始，清华大学试图跨学科拓展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并于 2014 年成立了住校文科学院——新雅学院，除启蒙教育外，在通识教育原理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教育改革。之后，2005 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开展本科生通识教育。还有一些大学开办了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尚无证据表明它们的尝试是借鉴了中国历史教育实践的经验。当前的通识教育课程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价值与道德重建、国际化和全球化等新挑战的背景下形成的。

反思通识教育

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意识到通识教育的价值，且正在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式。根据对“985 工程”大学的研究，通识教育发展的四个主要领域是：

- 确定目标：例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

的目的定位为：（特别是在于）打破学科之间的障碍，开发智力探索和知识的共同基础，通过全面了解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促进学生的发展；厦门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在人文、艺术、科学、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 发展核心课程：例如，北京大学在 2015 年开设了 30 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过讨论推动了经典阅读和教学；复旦大学建立了六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单元，共有近 180 门核心课程。

- 探索教学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已开设了新生通识教育研讨班，以开展综合性学习，包括文献综述、合作研讨、集体展示等；清华大学积极探索通识教育“小班化”教学，加强师生间的深入交流。

- 建立通识教育机制：大学通常在特殊学院或中心提供通识教育课程，但复旦大学设立了通识教育委员会来设计和规划核心课程。

初步发展，漫漫前路

尽管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正在发展，但大部分中国大学才刚刚开始建立相关框架。它们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是认识通识教育的价值。许多大学师生以及广大公众普遍认为，通识教育是无用的，专业教育才具备价值。其次，通识教育的学科基础是有问题的。中国的许多大学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关专业基础薄弱的专业学院发展而来。第三，教学法有待改善，因为许多教师习惯于把各种主题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讲课是主要的教学方法。第四，通识教育的学时和学分数量有限；通识教育项目的课程需要修改，把更多的学时和学分分配给通识教育。

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中国大学需要增加通识教育课程资源，提高教师能力，改革专业教育模式。中国的通识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刚性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创业公司”：中国的年轻精英院校

吴晗天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hantian.wu@mail.utoronto.ca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大陆已经建立了几个精英机构, 它们雄心勃勃, 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型研究型大学。典型的例子包括: 2011 年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 2013 年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 以及 2016 年成立的西湖高等研究院——为成立西湖大学做准备。这三所年轻精英院校不受中央政府的干预和零政府金融支持, 与其他现有的大学相比, 它们有着独特的发展战略、融资模式和招生政策。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并以其他模式为基础。主要由当地市政府或私营部门提供足够的资金。招生政策比较灵活, 与基于全国高考的现有体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这种制度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然而, 考虑到各自的院校愿景和以科学为中心的战略, 这可能也是由利益相关者 (包括地方市政府和高等教育实践者) 选择的一种新的实用主义方向的结果, 可能是受全球大学排名驱动。

三所年轻的精英院校

南方科技大学是位于深圳的公立小型研究型大学, 2011 年由当地市政府创办, 2012 年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 并被公认为“尝试、催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平台。2011 年, 在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南方科技大学以自己的标准招收了第一批 45 名本科生。2016 年, 它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现在, 南

方科技大学拥有 260 名教职工和 3 228 名本科生, 14 个学术单位 (即院系), 主要专注于物理、化学、生物和电子工程等理工类学科。

上海科技大学是 2013 年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的上海市小型公立研究型大学。2014 年, 上海科技大学根据自己的招生标准, 从 9 个省招收了第一批 207 名本科生。上海科技大学有四个学院 (即物理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 创业与管理) 和两个研究所 (即高级免疫化学研究所和人类研究所)。现有在校本科生 849 人, 研究生 1 272 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202 人。上海科技大学计划建立一支由 1 000 多名教授组成的教师队伍, 其中包括将从世界一流院校招聘的 500 名终身职位教授。

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一家位于杭州的非营利私立研究机构, 专注于科学和工程学科。它由市政府和杭州西湖教育基金会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 杭州西湖教育基金会是由中国顶尖科学家组成的私人基金会。西湖高等教育研究院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是清华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 担任该研究所所长。西湖高等研究院目前有四个研究机构, 专注于生物学、基础医学、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领域。建立这个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为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私立的、小型的精英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做准备。市政府提供财政和政

策支持，并成立了“推进项目建设”的特殊单位。

异同

根据这些新院校的使命和愿景，它们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打算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小型研究型大学，主要集中在理工类学科。其次，它们都选择了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作为模型或参照。例如，西湖高等研究院承认，它从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教育理念中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向西湖大学演进。

2016年，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表示，该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大学”。但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相比，在符合中国政治体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三，这三者试图探索替代模式来教育学生和办学。但是对于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来说，这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它们是公共资助的：在过去五年中，南方科技大学在入学政策方面与其他中国的大学越来越相似。

如上所述，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深圳和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富有的城市能够为各自的院校提供充足且可持续的资金。西湖高等研究院和未来的西湖大学则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所私立院校，西湖高等研究院主要由私有的杭州西湖教育基金会资助。其贡献者包括几位著名的中国企业家。杭州市政府提供了部分启动资金。可以预见的是，与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相比，作为一所主要由私人出资的大学，西湖大学可能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自主性。南方科技大学不再是唯一。虽然仍有自己的考试（在决定录取考生时占30%）和考

生的高考成绩（10%），但高考成绩是主要标准（60%）。上海科技大学的入学标准更加多元化。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推荐信、高中成绩和高考成绩都被考虑在内。“综合面试”用来考察他们的“综合素质”。“虽然高考分数占比最大，但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的录取标准比其他中国大学的录取标准要低得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高考分数是其他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作为一所私立的小规模大学，西湖大学未来可能会有更灵活的入学政策。

自下而上的创新还是实用主义的选择？

如上所述，这样的新兴“创业公司”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界自下而上的重大创新。现有的中国大学尽管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但仍受到苏联的影响，与之相比，这些年轻院校从一开始就遵循了西方模式，尽管在符合中国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干预很大。

然而，学者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功利主义的，可能是受到世界大学排名的驱动。这些院校的研究重点，以及遵循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模式和招募著名科学家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主流排名的评价标准。对地方官员而言，建立一流大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绩工程”，这也为这样的提升赋予了意义。因此，潜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诸如提高教育质量和提高青年学者科研能力等基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尽管中央政府干预措施相对有限，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也可能阻碍院校创新。由于市政府在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管理中起着较小的作用，因此，看看西湖大学如何发展将会相当有趣。换句话说，这些年轻的“创业公司”需要时间的考验。

